

中医教学

谈中药升降浮沉学说的形成与沿革

李 平

升降浮沉学说是中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特别是金元以来,它成为指导中医临床处方用药的基本法则之一,至今仍有一定指导意义。

一、升降浮沉学说的起源

笔者认为升降浮沉学说当起源于《内经》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指出:“清阳出上窍,浊阴出下窍;清阳发腠理,浊阴走五脏;清阳实四肢,浊阴归六腑。”就是说依靠清阳和浊阴有规律的升降出入,维持着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。与此相反,在病理情况下,由于“阴阳反作”及气机升降出入紊乱,故“清气在下,则生飧泄;浊气在上,则生腹胀。”并指出:“出入废则神机化灭;升降息则气立孤危。故非出入,则无以生长壮老已;非升降,则无以生长化收藏”(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)。这一认识在探讨药物作用机制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

针对人体升降出入机能的紊乱,自然产生了旨在调节这种机能紊乱的药物升降浮沉学说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云:“阴味出下窍(属沉降),阳气出上窍(属升浮)。”“味厚者为阴,薄为阴之阳。气厚者为阳,薄为阳之阴。味厚则泄,薄则通。气薄则发泄,厚则发热。”以上这些论述虽已初步涉及药物的升降浮沉概念,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。

二、升降浮沉学说的形成

《内经》而后,逮及宋朝,医药之书益众,未见有论及药物升降浮沉者。至金元时期,医事大兴,出现诸子争鸣的鼎盛局面。药物升降浮沉学说,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熟的。查阅现存文献,对此建树最大者,当首推张元素。张氏在《医学启源》中详细论述了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,并依据《内经》所论,创制了“气味厚

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”。他认为:“升降者,天地之气交也,茯苓淡,为天之阳,阳也,阳当上行,何谓利水而泄下?经云:气之薄者,阳中之阴,所以茯苓利水而泄下,亦不离乎阳之体,故入手太阳也。麻黄苦,为地之阴,阴也,阴当下行,何谓发汗而升上?经曰:味之薄者,阴中之阳,所以麻黄发汗而升上,亦不离乎阴之体,故入手太阴也。附子,气之厚者,乃阳中之阳,故经云发热;大黄,味之厚者,乃阴中之阴,故经云泄下;竹沥,为阳中之阴,所以利小便也;茶苦,为阴中之阳,所以清头目也。”由此可见,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主要受药物气味的支配和制约。药物的气味虽较复杂,但只要将每味药的气与味的厚薄情况综合起来,以阴阳理论为纲进行分析,就会对药物在人体的作用趋势得出正确的认识。

张氏还指出,同一种药物,入药部分不同,升降浮沉作用亦因之各异。大凡花叶及质地轻扬的药物能够升浮,子实和质地重浊的药物能够沉降。如麻黄“体轻清而升浮”,桂枝“体轻而上行,浮而升”,薄荷“浮而升”;石膏“体重而沉降”,杏仁“浊而沉降”。在“药用根梢法”中,张氏提出“根升梢降”的认识。其依据是:“凡根之在上者,中半已上,气脉上行,以生苗者为根。中半已下,气脉下行,入土者为梢。”基于这一认识,在辨证用药时“当知病在中焦用身,上焦用根,下焦用梢。”上述认识,在解释药物作用原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张氏还认识到加工炮制和配伍能够改变药物的原来属性,产生新的或截然相反的升降浮沉作用,以适应临床各种复杂病证的需要。他在谈到“药性生熟用法”时指出:“黄连、黄芩、

知母、黄柏，治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，须酒炒之，借酒力上升也。咽之下，脐之上者，须酒洗之；在下者，生用。凡熟升生降也。”就是说药物生用主降，熟用主升，若加酒剂等辅料，也可因辅料本身的功能而改变药物的作用趋向。另外，通过适当的配伍，一味药可改变其它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，如桔梗“辛苦，阳中之阳，谓之舟楫，诸药中有此一味，不能下沉”。而槟榔则“性如铁石沉重，能坠诸药至于下。”张氏的“引经报使”说亦是由此而产生的。

张氏还认识到了一种药物随所治病证不同，会产生不同的作用趋向。如“川芎上行头目，下行血海”(《本草纲目》第14卷)。此即某些药物的双向性调节作用，揭示了药物本身的多种属性，而这种属性有时又受主治病证所制约。张氏还用五运六气学说，将105味药物分为五运，即“风升生”20味，“热浮长”20味，“湿化成”21味，“燥降收”21味，“寒沉藏”23味。这样对药物作用趋势的认识具有了指导临床的实际意义。

中药升降浮沉学说的创立，补性味理论所未备，后世学者甚为推崇。李东垣注意到了四时节气的更替对人体脏腑气机升降出入的影响，以及药物升降浮沉的适时应用对这种影响的调节。他说：“药有升降浮沉化，生长收藏成，以配四时。春升夏浮，秋收冬藏，土居中化。是以味薄者升而生，气薄者降而收，气厚者浮而长，味厚者沉而藏，气味平者化而成。但言补之以辛、甘、温、热及气味之薄者，即助春夏之升浮，便是泻秋冬收藏之药也。在人之身，肝心是矣。但言补之以酸、苦、咸、寒及气味之厚者，即助秋冬之降沉，便是泻春夏生长之药也。在人之身，肺肾是矣。”(《本草纲目》序)。这里用五行生克的道理，说明四时节气、脏腑气机、药物升降浮沉之间的关系，指出用药必须顺应四时更替变化的规律。“用药者循此则生，逆此则死；纵令不死，亦危困矣”(同上)。东垣弟子王好古将药按气味厚薄升降浮沉分为五类，即：“味薄者升，甘平、辛平、辛微温、微苦平之药是也。气薄者降，甘寒、甘

凉、甘淡寒凉、酸温、酸平、咸平之药是也。气厚者浮，甘热、辛热之药是也。味厚者沉，苦寒、咸寒之药是也。气味平者，兼四气四味，甘平、甘温、甘凉、甘辛平、甘微苦平之药是也”(同上)。

三、升降浮沉学说的普及

明·李时珍综合金元时期药性理论方面的成就，考其异同，贯通诸家所论，对于升降浮沉学说作出了更为明确的阐述。他认为，从气味而论，“酸咸无升，甘辛无降，寒无浮，热无沉”。就配伍言之，“升者引之以咸寒，则沉而直达下焦；沉者引之以酒，则浮而上至巅顶”，故“升降在物亦在人也”(同上)。并指出用药必须顺应四时变化，“春月宜加辛温之药，薄荷、荆芥之类，以顺春升之气；夏月宜加辛热之药，香薷、生姜之类，以顺夏浮之气；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，人参、白术、苍术、黄柏之类，以顺化成之气；秋月宜加酸温之药，芍药、乌梅之类，以顺秋降之气；冬月宜加苦寒之药，黄芩、知母之类，以顺冬沉之气。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”(同上)。此见解较东垣又进一步。此后陈嘉谟在《本草蒙筌》中进一步指出了“酒制升提，姜制发散，入盐走肾脏仍仗软坚，用醋注肝经且资住痛，童便制除劣性降下”。

清·汪昂在归纳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，对药物气味与升降浮沉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概括。他在《本草备要》中指出：“气厚味薄者浮而升，味厚气薄者沉而降，气味俱厚者能浮能沉，气味俱薄者可升可降。”并用取类象的方法赋予药物的形和质以升降浮沉的含义，“药之为枝者达四肢，为皮者达皮肤，为心为干者内行脏腑。质之轻者上入心肺，重者下入肝肾。中空者发表，内实者攻里。枯燥者入气分，润泽者入血分。此上下内外各以其类相从也。”从而使众多的药物能够接受升降浮沉理论的指导，广泛运用于临床实践。

总的说来，明清时期是升降浮沉学说普及和推广运用的时期。这一时期的本草著作，大多都将升降浮沉学说作为辨证用药的说理工具，成为中药药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。